

内蒙古文史资料选辑

第二辑

内蒙古自治区文史研究馆编

目 录

德穆楚克栋鲁普与蒋介石的关系	陈绍武 (1)
我是怎样从“马贼”当上汉奸的	李守信 (25)
我率伪军在察北的罪恶活动	李守信 (53)
乌古廷投靠日伪前后	汪龙田、吴紫云 (83)
我和德王由张家口溃逃的狼狈相	李守信 (87)
北平三年	德穆楚克栋鲁普 (100)
我搞所谓“西蒙自治”的经过	德穆楚克栋鲁普 (119)
赴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经过	德穆楚克栋鲁普 (153)

德穆楚克栋鲁普和蒋介石之关系

陈 绍 武

(一)

伴随着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东北事变，东蒙各盟旗相继沦陷，许多蒙古上层分子和部分青年，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直接怂恿支持和指挥下，在东北通辽一带，搞起所谓：复兴蒙古民族，实行自治的运动。在这时，西蒙西苏尼特旗的札萨克德穆楚克栋鲁普，看到东蒙当时的情况，认为日本的“满蒙政策”是要掌握全蒙，得了东蒙以后，必然会继续西侵西蒙，而南京的国民党政府，既没有在华北御敌的任何准备，当然也就更无力顾及到边陲遥远的蒙旗。在此内外环境急剧变化的矛盾中，如果能联合各盟旗封建王公以及其上层分子，结成一个有组织的较大的蒙旗力量，向国民党政府进行勾搭，讨价还价，必然能得到很多便宜。就是为了个人能统一掌握蒙古大权，也必须首先得到国民党政府的撑腰，才能够提高自己的地位和威望，便于领导指挥，扩大封建统治。

德穆楚克栋鲁普就按照他这个政治逻辑和主观想法，于一九三二年秋末，偕同其乌济纳苏木总队官兼锡林郭勒盟驻张办事处处长补英达赖（德穆楚克栋鲁普的姨夫，当他年幼时，许多对外活动问题，咸由补英达赖为之帮助策划）从西苏尼特旗启程前往北平。

到了北平之后，开门头一炮，就将“团结蒙古各阶层，复兴民族”的漂亮幌子举了起来，号召所有在北平的蒙古人士特别是

青年学生，团结一致，行动起来，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努力。并按其既定方针和步骤，展开活动，除访问在北平的国民党军政当局，进行感情联络并要求给予关顾外，则与当时住在北平的蒙古王公和上层分子贺喜业勒图默尔根、云端桑宝、多尔吉、沁布多尔济、汉罗札布、包悦卿、白瑞、韩凤林等人进行联系，相互往来，酝酿些日，方始商定组织了一个包括十余名盟旗代表的“蒙古王公代表团”（我是代表喀左本旗，在南京参加该团的），并公推锡林郭勒盟东苏尼特旗达尔罕郡王郭尔卓尔扎布为团长，于一九三二年冬由蒙藏委员会驻平办事处处长李芳春陪同，赴南京请愿。德穆楚克栋鲁普和补英达赖则没有参加代表团，置身圈外，专作幕后指挥。

“蒙古王公代表团”和德穆楚克栋鲁普等相继到达了南京之后，就按照他们既定的方式和步骤，分别进行活动。一方面用“蒙古王公代表团”名义发表请愿书，招待新闻界，公开要求国民党政府出兵抗敌，收复东北蒙旗，同时要求改组蒙古各盟部旗联合驻京办事处，以资团结蒙众、统一意志、集中力量，在蒋介石的统一领导下，实行抗日杀敌，收复失地（抗日杀敌是幌子，改组蒙古各盟部旗联合驻京办事处是真正企图，为的是利用联合之名，以便指挥操纵各盟旗）。另一方面德穆楚克栋鲁普除与有关部门首脑进行重点活动外，并单人独马在励志社内谒见了蒋介石。

德穆楚克栋鲁普在政治舞台上初露头角，野心虽然不小，但对政治活动究竟缺乏经验和锻炼。他和蒋介石初见时，因汉语不甚流利，许多地方辞不达意，不能畅所欲言，讲话颇感嗫嚅，仅以态度和简单语句向蒋介石表示说：“今后决以实际行动，设法团结所有王公和蒙众，忠诚拥护委员长，并听从一切指挥和命令。”当时蒋介石可能亦因初次接见德穆楚克栋鲁普的关系，没有什么特别的具体指示；仅以一些对地方长官和少数民族人物常讲的照例话语，向德穆楚克栋鲁普安慰一阵，鼓励一番，便结束了二人

的会见。

逗留在南京的德穆楚克栋鲁普、补英达赖和“蒙古王公代表团”又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蒙藏委员会委员白云梯、克兴额等勾结一起，一致认为：蒙古各盟部旗联合驻京办事处究竟不是正式行政机构，我们费了很大力气，即使能达到改组的目的，掌握了它，亦恐难以控制蒙古各盟旗，有所作为，反不如直截了当要求改组蒙藏委员会，比较彻底，将来果能掌握了它，确能发挥一些作用。因而他们就将原议要求改组蒙古各盟部旗联合驻京办事处的事情搁置一边，进一步打起反对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石青阳，要求改组蒙藏委员会，任用蒙藏人士为委员长的旗帜，扩大了活动范围，结果弄得一败涂地，于一九三二年年底，发表了一个失意性的简短宣言，离开南京而北返。

(二)

这个具有政治野心的德穆楚克栋鲁普，虽然在南京的活动未能如愿，但却有了这个代表团的班底，作为他政治活动的本钱。于北返后，便各处奔走，酝酿其所谓“内蒙古高度自治”运动，终于在一九三四年春，得到了成功，并于四月二十三日假乌兰察布盟喀尔喀右翼旗百灵庙永乐会仓（总仓之意）大厅里，举行了“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成立典礼，由国民党政府派大员何竞武莅临监誓，各盟旗都有王公士官代表参加，其他各地方政府的来宾代表、观礼的也不少，相当热闹。

德穆楚克栋鲁普是这个委员会的秘书长，掌握实权，总算是称心如意了，但他一上台就感到有两件大事立待解决，就是如何设法维持全体职工生活和怎样保护该会安全的问题。因为那时虽然领到国民党政府所拨的三万元开办费，不分等级地给所有职员杂役每人每月发给十五元的生活维持费；并由西苏尼特旗调来了二百多名乌滂守备队，担任警卫。但这仅能维持一时，而不是根

本解决的办法，如果不另行筹划，就可能在预见到的时间内因无兵无钱而使一年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搭起来的这个架子瓦解，实在可惜。

因此，德穆楚克栋鲁普便把这两个问题视为关于蒙政会存亡的关键问题，昼夜焦虑，寝食不安，曾与其亲信韩凤林（蒙政会保安处科长兼保安总队队长）和我，数度密议，寻求解决途径。经我们三人思考的结果，一致认为国民党政府麻木不仁，办事拖延，敷衍成习，有些问题如不给予强烈刺激，很难引起其注意，得到迅速而有效的解决。尤其一切大权操于蒋介石一人手中，无论什么重要问题，如不直接请准他的时候，不容易得到解决。因此便商定派我代表德穆楚克栋鲁普前往庐山，去见蒋介石，直接和他进行勾搭，以求根本解决蒙政会面临的两大严重问题。但当时又想到这两大问题，在蒙政会方面来看固属紧要，刻不容缓，但从整个国家上看，究竟问题还算不大，殊难引人重视。因又反复思索，由我提出，“在目前国内外形势下，若想刺激蒋介石有所反应，最好的方式是提出又现实又有力的边疆安危问题。请他指示如何应付的具体办法；以此为借口，进而要求经费和武器，以便健全蒙政会，更好地团结和掌握蒙旗，拥护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加强御敌力量，才有可能引起他的注意和重视，给予实际援助。”当时德、韩二人除同意我所提出的主张外，更由德穆楚克栋鲁普补充一项具体的材料说：“在数月前（约为一九三四年夏初），满洲国兴安西省警备军代理司令官乌古廷，陪同一个日本关东军高级军官来西苏尼特我的家中，会见了我的长子都嘎尔苏龙，声言日本军不久就要西进，攻打察东，如果欢迎的话，希予一切实力帮助，要我速给答复，表明态度。如以此项事实作为具体内容，岂不是更较现实而有力。”我和韩都说好，便最后决定以报告这件事情，请示应付机宜为理由，余事统交由我届时相机办理。

虽然决定派我赴庐山去见蒋介石进行勾结，但想到蒋、德二

人仅仅是一九三二年冬在南京晤谈过一次，彼此之间印象不深，认识尚浅，当然更谈不到有什么深厚的政治关系。这次派我赴庐山能否见得上、即或见上，是不是能够得到具体而如愿以偿的回答，都是问题。因而决定暂守秘密，即便得不到圆满结果回来，也仅是白跑一趟，不致使德穆楚克栋鲁普的面子和声望受什么影响。于是我便扼要地代写了一封德穆楚克栋鲁普给蒋介石的信，内容大意是：“现在边事日趋危急，蒙众惶恐不安，应付至感困难，因特派本会（蒙政会）参事陈绍武为代表，前往牯岭，晋谒钧座，面报边情，请示机宜，谨乞赐见为感。”此外又携带了几张盖印德穆楚克栋鲁普手章的空白信纸，准备届时便于相机行事。并为了守密，命我以请假回北平探亲名义离开百灵庙，甚至往返路费也由德个人拿出，并没有惊动会计人员，以防泄漏秘密。

我于一九三四年八月中旬的一天早晨，离开了百灵庙蒙政会，中途在北平逗留两三天后，即取道平汉路南下，经汉口、九江等处，迳抵庐山牯岭。到牯之后，就按规定办法先到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侍从室登记报到，但侍从室告诉我说：“委员长现在到海会去了，不在牯岭，什么时候回来，我们不知道”等语。我回旅馆后反复考虑，如为了求个究竟一直等下去，旅费恐成问题；不等待马上回去吧，远道跋涉，得不到一点结果，连自己也交代不下去。在这种势处两难的情况下，想了一个折中办法，于次晨去见行营秘书长杨永泰，将准备面递蒋介石的信交给了他，并将来意概略向他陈明，以商量的口气探问他，可不可以去海会见蒋。他很冷淡地对我说：“你所谈的事情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紧要问题，不见委员长都可以，事情我可代为转达，这个信交给侍从室。我看明天你就回去吧！”当时我也想不出其他的好办法来，只好按他所说于次晨将信交给侍从室，随即下山循原路兼程折回北平。

我回到北平没过几天，蒙藏委员会驻平办事处处长李丹山深夜到我家中给我送来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的密电一通，内容大意为：

“顷奉蒋委员长电谕，请台端速去牯岭晤谈”等语。我想这必是我留交行营侍从室的信蒋介石看到了，才来电找我。当时又反悔又高兴，后悔的是我不应该急于北返，高兴的是我有了见蒋介石的希望。当时一面打电报将经过情形报告给德穆楚克栋鲁普，一面在北平筹措了路费，迅即重赴庐山。

到达牯岭之后，仍旧按照规定手续前往行营侍从室登记报到，第三天就见到通知，说由行营参谋主任晏道刚代见。这使我又感到失望，千里迢迢，往返两次，仍不得一见蒋介石本人，实在是为之扫兴。然而事已至此，又不得不按照通知去见代见人，好坏求得一个究竟。见晏道刚依然如见杨永泰一样，将我来意概略地谈了一下，要求速予转呈请示，以便即早离牯返蒙。他表示同意，我即辞出，在旅馆等候了三两天没消息，又去找晏催问，第六天晏道刚找我去谈，他说：“你和我所谈的问题，都已转达，现在委员长要亲自接见你谈谈。”他看了看手上的表说：“时间快到了，请你速到牯岭十三号，门内有一个姓戴的副官在等候你。”我听了他这个口头通知后，好象丢失了东西的人，把东西重又找了回来一样，颓丧失望的心情忽又兴奋起来了。当即依照晏嘱到了牯岭十三号蒋介石的官邸，果然有一个副官问明我的姓名后，就引我到了一间小客厅，没过几分钟，我所想的国民党独裁统治者，同时也是我的校长（南京中央政治学校）蒋介石，终于出现在我的面前。（当时我因充当德穆楚克栋鲁普的代表的关系，没露政校出身的身份。）双方寒暄后遂即转入了正式谈话。

谈话一开始，我首先代表德穆楚克栋鲁普郑重其事地向他表示：“蒙古同胞日夜所盼的蒙古自治问题，在委员长的关怀和支持下，业已实现，并成立了统一的自治政务机构百灵庙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因而蒙古同胞异常感奋，纷纷表示：今后一心一德拥护中央，愿在钧座的领导下，为国家、为蒙古事业献出所有力量，努力前进。”等一套虚伪恭维的话。其次就将日本关东军

官来到德王府实行威胁利诱、察锡两盟地区日趋危急的情况，简明扼要地报告了一番之后，接着就请示如何应付的办法。最后才把远道前来的真正目的，要求发给蒙政会各项费用（包括常年经费和建设费）和装备保安队的各种武器以及交通工具等事项提出，俾便加强蒙旗实力，在委员长统一领导下保卫国土。

我将上述的报告和请示谈完之后，满以为他必有一番激励恳切而具体的表示和答复，其实不然，他神情淡淡很轻松地说：“你回去告诉德王，日寇如果继续西侵，可以不亢不卑，相机应付。经费、武器和交通工具可以拨发。”再没继续谈什么，就将话题转到询问德穆楚克栋鲁普的性格、作风和日常生活、家庭状况等一些无关重要的日常琐碎的事情上去了。

他如叙家常话似的，面带笑容问我：“德王怎么样？”我听了 he 这样笼统的问话，不明白他的重点所在，一时不知从那里答起。但我立即想到，千里跋涉，主要目的还不是为了要进行勾搭？因而我也就笼统地乘机将德穆楚克栋鲁普加以吹嘘，借以引起他的注意和重视，以便促使蒋、德二人情感上接近，政治上勾结，因此我就回答说：“德王在所有蒙古王公中，可以说青年有为，意志坚强，处事待人，诚实和平，而且素以团结蒙古同胞，复兴民族事业为己任，对蒙古王公和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一向不断联系团结，在蒙旗声望很高，因而蒙古各阶层大部分都与之接近，并很信仰他。他日常和我们说：“只有拥护蒋委员长，听他的话，忠诚服从他的领导，不论民族也好，个人也好，才有光明前途。”他听了 my 这一番答话之后，脸上似已浮现出注意的神色，接着又问：“德王的身体健康如何？性情怎样？平素有些什么特长和爱好？有几个儿子？”我当时听了 he 这一番问话，真有些莫明其妙，为什么对很多有关政治性的事情抛开不谈，反而问些属于个人私生活的问题，其用意安在呢？随后我才意识到，他如此耐心而详细地对于个人生活细节问题问长问短，大概是在表示特别关怀的

意思，这可能也是蒋某人驾驭部下的方法之一。当时我也就只好据实以答：“德王身体健壮而胖；性情在温和中带有刚愎自用，平素爱好音乐、射击和研究历史书籍，特别是关于历代名人传记，并喜摆弄机械等新奇东西，他有四个儿子一个女孩。”他连声说好！好！站了起来和我说：“不久我想去绥远和蒙地看看，你要快些回去告诉德王。”接着就指示其在座的记录秘书，以所谈不亢不卑，相机应付为重点内容，给德穆楚克栋鲁普写一封回信，交我带回，同时又嘱咐赶快派人好好招待我，遂即结束了谈话。

我回到旅馆，不大工夫，行营侍从室就派来了一个副官给我送来一封回复德穆楚克栋鲁普的信，并将旅馆账还清，送给我五百元路费。于是两上庐山的我，终于达成见蒋介石进行勾搭的任务，离别了牯岭取道经南京而北返。

(三)

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旧中国，住有少数民族的边疆地区，如内蒙古各盟部旗与其毗邻接壤的边疆省份及其所辖各县之间，行政区划及管辖范围，从来就没有明确地划分和规定。其中还有不少地方是蒙汉杂居，旗县并存，形成了双重政治的错综复杂局面。因而盟旗省县的两方面的统治者，为了保持和扩大其统治地盘，常常利用当地客观存在的各种矛盾和复杂情况，实行挑拨离间，故意制造民族纠纷和冲突，以至更严重的民族仇杀事件。我们从此也就可以理解到，在旧时代，边疆地区的民族关系所以不断恶化并经常发生民族冲突和民族仇杀等不幸事件，并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它是经过边疆地区的统治者和封疆大吏们的怂恿挑拨，逐渐演化而发生的。

继一九三三年冬的内蒙古各盟部旗长官自治会议之后，于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三日百灵庙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即正式宣告成立，从此就与绥远、察哈尔两省，特别是和绥远省之间，为

了管辖治理权和过境税收等基本问题，在一个暂短的时间内，双方之间的摩擦和斗争异常激烈。

国民党中央和蒋介石本人，看到当时蒙、绥两方存在和发生的各种矛盾，他们就认为有机可乘，就采取了两边拉拢，双方讨好的方法，进而利用双方使之互相牵制，借此好使双方都来依付他、拥护他、听他的指使、为他效力、以资达到便于指挥和统治的目的。

当我在牯岭面见蒋介石的时候，他曾说过，你要快些回去，不久我想到绥远和蒙古看看。早就透露了他要亲自出马，借视察之名，实行其两面拉拢手法的用意了。果然我从庐山返回百灵庙刚过几天，蒋介石的特派代表肖振瀛携带着蒋介石送经德穆楚克栋鲁普的一对金丝猴皮褥子的贵重礼物，来到了百灵庙。蒋介石的亲信部下很多，为什么要专专选派一个和他并不怎么近的二十九军的人为代表呢？原因是肖在察哈尔省很早就与德穆楚克栋鲁普认识，并且交情甚笃，蒋介石选派他来，为的是利用德肖二人能说私话的朋友关系，好为他达成拉拢德穆楚克栋鲁普的任务。

肖振瀛负着蒋介石使命到达百灵庙之后，他首先表示：他这次来具有公私两方面意义，公的一方面是代表蒋介石；私的一方面是看看老朋友。（关键问题就寓于看看老朋友的一句话里边）因而他在次日就在荒漠草原上的蒙政会的职员中展开了活动。开场头一出就是通过蒙政会的委员长云端旺楚克（乌兰察布盟盟长兼喀尔喀右旗札萨克达尔罕亲王）和秘书长德穆楚克栋鲁普（锡林郭勒盟副盟长兼苏尼特右翼旗札萨克都固楞亲王）二人，召集了蒙政会的部分高级职员会谈。当时他首先当众宣布了他的使命说：“我这次来到百灵庙，系代表蒋委员长面来，蒋委员长约在两三天内亲莅绥远视察，原本打算来到这里和云、德二王以及大家见面谈谈，嗣因事忙实在抽不出时间到这里来，派我来邀请云、德二王前去绥远晤谈。”他简短的几句话就把所负的使命传达完了。接

着他以个人资格谈话，继续说：“委员长很关怀蒙古同胞的生活和蒙政会的发展，尤其是关心云、德二王的健康和前途。这次到绥远特邀云、德二王前去晤谈，具有深远的意义，真是千载难遇的机会，所以希望大家劝促云、德二王无论如何要去一趟才好。”大家听完了肖氏的谈话之后，纷纷议论起来，结果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意见和看法。一部分人认为蒋介石在庐山既已表示过要亲来蒙地看看，现在为什么中途改变了主意，到绥远而不来百灵庙，派代表来敦促云、德二王务必去绥远谈呢？里边必有文章，甚至隐藏着什么阴险计谋，也未可知，万不可贸然前往，以身涉险；与此相反，有一部分人则认为蒋介石考虑到如果亲来百灵庙和云、德二王晤谈，恐怕傅作义不高兴，为了不得罪傅才派代表邀请云、德二王去绥远晤谈。如此折中的办法，既不得罪双方，又可达到向双方讨好，两面拉拢的目的，可谓一举两得。再说，云、德二王身为地方长官，国家最高军事统帅莅临绥远就应自动前往晋谒，才符合官场的礼节规矩，现在人家又特派代表前来邀请，可以说给了很大的面子，应无异议，打消一切不必要的顾虑，迅即前往才对。如果疑神疑鬼，顾虑多端，拒绝前往，不仅于情于理都说不下去，同时也是自误前途，未免可惜。因此主张云、德二王立即去绥晤谈。

上边两种不同意见，何去何从，云端旺楚克是无任何成见的，去也好，不去也行，总之，一切听从德穆楚克栋鲁普的摆布。可是德穆楚克栋鲁普对此问题，就犹豫不定。去吧，恐怕发生意外；不去吧，又失掉与蒋进一步靠近与勾结的机会，实在也是自绝政治前途。但是矛盾势必统一，问题终须解决，因而在肖振瀛召集蒙政会高级职员讲话的当天傍晚，德穆楚克栋鲁普就秘密地和我谈：“同仁们的议论和意见，你都听见了吧？他们的主张虽然有所分歧，但基本出发点都是为了蒙政会的前途以及云委员长和我个人的安全打算，应该接受那一边的意见为是，我觉得着都没什么关

系。总之无论问题的性质如何，只要对蒙古前途有益，那末我就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不过我要问问你，你在庐山见蒋的时候他的反应态度如何？我们现在也可以作个参考，来研究研究去绥与否的问题。”当时我也就毫不客气地据实以对：“你派我远道跋涉，前往庐山见蒋，其目的是不是为了和他进行勾搭，以利于蒙古事业和你个人前途吗？我在牯岭见他的时候，看他的态度很和蔼亲切，甚至对你的日常生活细节问题，亦表示关怀，询长问短。这次他到绥远不来这里，是为了不得罪傅作义也好，抑或因为事情忙没有时间也好，我们现在都不要管他，问题的要点是在于事情只要和我们的原来打算基本上一致的话，那就有些零星枝节性的困难问题发生，我们也应该设法打破，极力避免，俾使基本目的实现，何况现在蒋又特派你的好朋友肖振瀛先生前来邀你呢？固然，在最近一个时期内，蒙绥之间虽有些矛盾和摩擦，~~但是~~是，乘这次到绥的机会，和傅作义见面谈谈，今后双方果能开诚相见，遇事互相商量，即或有些分歧意见，亦可使之接近、渐趋一致，得到最后的合理解决，这也是捎带着就可以办理的事情。总之一句话，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前怕狼，后怕虎，那还能成功什么事情。”德穆楚克栋鲁普听完了我这一番话之后，他稍微思索一下说：“好！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你说得很对，那么我们就决定明天首途去绥。”

接着他就邀请其挚友肖振瀛到其寓所（蒙古包），两人就在久别重逢畅叙离绪的幌子下，开始畅谈其所欲谈的心腹之言，也就是肖氏传达蒋介石之所以派他前来的真正目的，完成拉拢使命的一次密谈。

时间约在一九三四年十月间，蒙政会委员长云端旺楚克和德穆楚克栋鲁普，率同随行人员和我，随同蒋介石的特派代表肖振瀛由百灵庙到达绥远。

我们到达归绥（今呼和浩特）的当天下午五六时许，蒋介石就由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陪侍，从张家口乘火车来到了归绥。到

车站去欢迎的蒙、绥两方党政军各界人员虽说不少，而蒋介石一下车首先就和迎候在月台上的云端旺楚克、德穆楚克栋鲁普二人握手致意，并说了几句简短的寒暄客套话，才与其他迎候人员顺序握手，遂即入城迳赴旅邸。次日午后三四时左右，就在其行邸接见了云端旺楚克、德穆楚克栋鲁普二人。当时随同云、德二人前往的还有蒙政会财政委员会主任包悦卿和我。

当我们和蒋介石见面时，他就首先看了我一眼，随即说了一句：“你从庐山早回来吧。”接着就与云端旺楚克、德穆楚克栋鲁普二人开始谈话，双方周旋半，蒋介石就郑重其事地面向德穆楚克栋鲁普说：“你派他（指我说）到庐山见我，要求拨发经费、武器以及通信器材等问题，你放心，我回京后即予拨发，你可派人迳赴南京，分向各主管部门洽领。此次我派肖振瀛去百灵庙，大概他已和你谈过了吧？不要紧，今后你有什么事情，只管和我讲，我必给你解决，你要好好努力。”他把几句紧要的话讲完之后，又问了问蒙古同胞的生活状况，遂即结束了会谈。当晚又同其妻宋美龄设宴款待云、德二人，于次晨乘机离绥赴太原。云端旺楚克、德穆楚克栋鲁普二人，则乘到绥远之便，分别拜访了绥、察两省主席傅作义、宋哲元，略略谈了谈蒙、绥、察之间以后如何互相谅解、进而互助合作等问题，便离绥返回百灵庙。

（四）

蒋介石在绥远行邸接见了云端旺楚克和德穆楚克栋鲁普二人的时候，已面许拨给蒙政会经费、武器、通信器材和交通工具等物资。据此而示，云德二人由绥返抵百灵庙之后，即行研商派人赴京的问题。他们认为百灵庙蒙政会成立以来，时逾半载，始终没有派人赴京对国民党政府特许蒙古自治有所表示，因此决定派保安处处长补英达赖和我为蒙政会晋京答谢代表，兼办请领经费等事宜。当时献送的礼物是：向蒋介石献军马百匹，向国民政府

主席林森以下各院部会长官，分送蒙古土产皮毛等品，以表谢意。

我和补英达赖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初从百灵庙出发，到达南京之后，由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石青阳引导，按照一般地方首长或代表谒见国家元首的礼节，首先谒见了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代表蒙古同胞和蒙政会，对于特许蒙古自治并成立蒙政会表达了谢意，献送了礼品。林森也就代表国民政府回答了几句“天官赐福”的例行话，并照例送给我们一桌酒席，答谢礼节就完成了。继而谒见蒋介石，和谒见林森一样，一通官样文章就算了事。他迎合我们的愿望说：“你们所要求的经费和武器等东西，我马上就批交财政、军政两部迅予拨发，你们可以直接向该两部洽领。”同时他以得意的神情微笑着说：“我看德王很好，你们回去告诉他，让他好好干，今后如遇什么困难问题，尽可和我讲，我必给他解决。”过了几天，就接到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的通知，转达蒋介石的批示，说已令财政部拨发蒙政会建设费十二万元（一次），经常费每月三万元。军政部拨发步枪、手枪三百余支，轻重机枪二十余挺，迫击炮数门，载重汽车四辆，大小无线电机十台，命我们直接向各该部洽领等语。据此，我们就分别去见财政部长孔祥熙和军政部长何应钦，送了礼品后，随即提出洽领经费、武器，通信器材和交通工具等问题，孔、何二人咸表示遵照蒋委员长的批示办理。嗣与两部直接主管人员数度接洽，除建设费先拨一万余元数续拨以外，其他经常费和武器等均照批示数目分别拨发。但对武器的领取手续一节，蒋介石又来了一个两边讨好、双方不得罪的老办法，命令绥远省主席傅作义代领转发。傅作义派张副官代领后，就在南京转交给我们。

此外，又按行政隶属系统关系，晋见了一次行政院长汪精卫，照式办理。我们完成任务后，于一九三五年春初返回百灵庙。

这些经费武器和物资，奠定了蒙政会的基础，增加了德穆楚克栋鲁普个人政治活动的资本。

(五)

德穆楚克栋鲁普和蒋介石之间，经过信使往来、亲自晤谈等方式，两人的关系搞得很近。但在另一方面，德穆楚克栋鲁普却又与日本帝国主义发生了关系，并按蒋介石所指示给他的“不亢不卑，相机应付”妙着，与之勾结合作，搞起了投敌卖国的勾当。就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实力支援和指使下，树起叛国旗帜，于一九三六年一月间，在其西苏尼特旗王府成立了伪“蒙古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兼政务部部长。嗣于三月间又与日本帝国主义商定，在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索王府，召开了第一次“蒙古大会”，决议扩大反动组织机构，取消伪“蒙古军总司令部”，在嘉卜寺（即现今之化德）另行成立伪“蒙古军政府”。依据这个决议，遂于五月二十三日，在嘉卜寺正式成立了伪“蒙古军政府”，由蒙政会委员长兼乌兰察布盟盟长云端旺楚克任主席，蒙政会副委员长兼锡林郭勒盟盟长索特那木拉布坦和蒙政会副委员长兼伊克昭盟盟长沙克都尔扎布二人任副主席，德穆楚克栋鲁普则任总裁兼蒙古军总司令，总揽军政大权，实际操纵一切。

正当德穆楚克栋鲁普和日本帝国主义勾结合作大搞叛国勾当的时候，南京国民政府将百灵庙蒙政会割分为二，另成立了“绥远省境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简称绥境蒙政会）和“察哈尔省境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简称察境蒙政会）两个蒙政会。察境蒙政会由锡林郭勒盟盟长索特那木拉布担任委员长，德穆楚克栋鲁普任副委员长。因此德穆楚克栋鲁普就在原百灵庙蒙政会的班底上将察境蒙政会也同时设在嘉卜寺（有名无实）。一方面搞伪蒙古军政府，另一方面又拿这个察境蒙政会的名义，继续和南京国民政府以及蒋介石往来，并领取经费及雪灾救济款等。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芦沟桥事变，继而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战争，自东北疯狂西侵，其北路军则由察东

多伦向西进攻，数月之间，我西蒙各旗和京包铁路沿线上的张家口、大同、绥远以及包头等重要城市，相继被其侵占，在如何统治占领地区的问题上，它采取了割整为零，分而统治的政策。按其军事进展的情况，自东而西，在其占领的地区内，利用了一小撮投敌卖国的汉奸们，有计划地逐步成立了“察南自治政府”（在张家口）和“晋北自治政府”（在大同）两个伪政权而外，则又指使德穆楚克栋鲁普以伪“蒙古军政府”名义，于一九三七年十月末，在归绥召开了第二次“蒙古大会”，假借民主方式，决议取消原“蒙古军政府”名义，另行成立了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仍由云端旺楚克任主席；德穆楚克栋鲁普任副主席，但是云端旺楚克虽任主席，却住在达尔罕旗王府中，每天诵经念佛，始终没有到任视事，两年后云王死了，由德穆楚克栋鲁普继任主席，因而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的一切事务，自始就由德穆楚克栋鲁普总揽主持。同时，日本人则以顾问、参与官、参事官等等名义参与伪蒙政权各级组织内工作，监督把持。但在某些问题上只要与日本帝国主义根本利益没有什么损害，有时还很尊重德穆楚克栋鲁普的意见，因此德穆楚克栋鲁普以为利用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援来实现自己目的中的事业或有可能，兢兢业业干得很起劲。

后来日本帝国主义以侵占蒙疆地区为时已久，原先所采取的割整为零分而统治的政策，已不合现实需要，翻过来又采取了并零为整划一统治的政策，在张家口成立了一个伪“蒙疆联合委员会”（“蒙疆”二字名称自此始）统一指挥蒙疆地区内的三个伪政权。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这个新政策和措施，德穆楚克栋鲁普表示反对，不愿意“蒙疆联合委员会”在自己头上做婆婆，受其管辖指挥。但是，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贯彻其既定的方针，不理他那一套，遂即施加压力，迫使德穆楚克栋鲁普到张家口就任伪“蒙疆联合委员会”总务委员长，并在日本驻屯军司令部内举行就职典礼。后来在合并察南、晋北、蒙古三个伪政权成立伪“蒙疆联